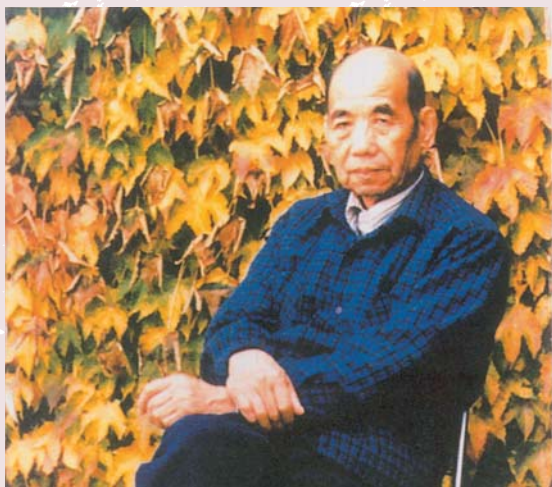


# 雲南情——憶李霖燦先生

李玉珉



我是一個快樂的人，因在比較之下，有人是幹一行怨一行或怒一行，好一點的幹一行像一行。

我則是幹一行樂一行，做了一輩子博物館員，

求仁得仁，至老興致不衰。

心想若有轉世大法，還要來陽世數轉。

一回研究磁器，

一回研究銅器、彫漆、琺瑯，樣樣有趣，

十次轉世只怕還不能滿足一己之望。

——李霖燦

一個事業體的成功是幾代人努力的成果，而前人所樹的風範，往往又是後人學習的對象。三十年前，我是一個只進過一次故宮、根本不知藝術史為何物的粗人，故宮與我不曾發生任何關係。後來因緣際會地進入故宮服務，在這個環境裡，我有幸地認識一些前輩、長者，如李霖燦先生、江兆申先生、張光賓先生等。從他們的身上，我深深地體會到「故宮孕育了

幾代人，而這幾代人又造就了故宮」的道理。

我並非李霖燦先生的學生，當民國七十三年秋進入故宮服務時，李先生也已退休一年有餘，因此我也無緣與他共事，甚至還沒有聆聽過他任何一場演講。由於在美國讀書時，我的主修是佛教藝術，所以對鑽研中國繪畫史的李霖燦先生，並不熟悉。如此看來，我與李先生實在沒有太多的淵

源，當然也應該不具備談論李霖燦先生的資格。可是一張古畫——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卻搭起了李先生與我之間的橋樑，讓我有機會接觸這位長者，進而感受到他身上所散發出來的光和熱。

初入故宮時，時常會在陳列室中，看到一位穿著白襯衫與西裝褲、手提著陳舊的黑色皮包、頭圓頂禿的長者，佇立於展櫃前觀賞作品。他神

情專注，有時嘴角還略泛笑意，一副怡然自得、沉醉其中的樣子。後來，同事告知，這位就是故宮博物院的前副院長李霖燦先生，當時心中想著這位副院長長得還真不氣派。

民國七十四年秋天，在幾位有心推動藝術史研究的學者積極奔走下，於東吳大學舉辦了一次盛大的「中國藝術史」研討會，集結了當時在台灣中國美術史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學者，同堂討論，會中我發表了一篇〈張勝溫梵像卷之觀音研究〉的論

文。二十年前，台灣的學術界對佛教藝術十分陌生，更遑論佛教圖像的研究，所以如我所預期的，我的論文在會中並沒有得到太多的回

響。可是就在討論會結束不久，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訴我國立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李霖燦先生找我。那次晤面，我們二人聊了大約半個小



圖一 大理國 張勝溫 梵像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中國藝術史研討會紀念照，前排右一為李霖燦先生。1985

時。猶記得他說，很高興〈梵像卷〉的研究終於後繼有人；同時他又提

到，〈梵像卷〉內容豐富，雖然他曾經進行過一些探討，可是由於自己不懂佛教，一直無法深入，所以他頻頻鼓勵我這個後學晚輩，希望我能在這一研究課題上，繼續努力。這是我回國後，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研究之路並不孤獨。

隔了不久，李先生又來找我，並帶來了一疊遼寧省博物館所藏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黎明仿〈丁觀鵬摹法界源流圖〉的黑白照片。〈丁觀鵬摹法界源流圖〉是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乾隆皇帝敕命丁觀鵬摹寫〈梵像卷〉所繪製的畫作。黎明摹本中乾隆的題跋也稱，〈梵像卷〉中「諸佛、菩薩之前後位置、應真之名因列序，觀世音之變相示感，多有倒置，昔諡之章嘉國師，悉為正其訛舛，命丁觀鵬摹寫成圖，以備耆闍圓勝功德。今復命黎明等摹觀鵬筆意，為此圖。」因為這黎明卷的母本〈丁觀鵬摹法界源流圖〉是經藏密權威章嘉呼圖克圖所指點，所以黎明和丁觀鵬的〈法界源流圖〉無疑是研究〈梵

像卷〉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不過二十年前，只有《藝苑掇英》發表了數張丁觀鵬〈法界源流圖〉局部的圖版，所以我雖然知道這兩個摹本的重要性，可是由於當時兩岸不通，根本無法取得它們的圖版資料。李先生拿著黎明摹本的照片告訴我，這是以前在故宮服務的導覽員張文玲小姐（如今是展覽組科長）在德國留學期間，遼寧博物館的精品至德國展出時，她特別向德國和遼寧省博物館申請，為李先生所拍攝的。最後他說：「今後我大概不會再從事〈梵像卷〉的研究了，這批資料對妳應該有用。」當時我手捧著這疊珍貴的照片，想想這位與我只有數面之緣的長者，對我如此關愛，真是受寵若驚。心中暗忖，我一定不能辜負李先生對我的期望。可是，迄今我雖然先後發表了數篇〈梵像卷〉研究論文，可是一直沒有全力以赴地投入這一畫卷的研究工作，真是愧對李先生對我的厚愛。

民國七十九年，一群朋友組成了「雲南大理佛教文化考察團」，赴昆

明、大理、喜州、劍川考察十天。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踏上大陸的土地，也是第一次拜訪雲南。可是無論是在昆明或是在大理，大陸的學者第一個向我打聽的人物就是李霖燦先生，並紛紛要我代為轉達他們對李先生的敬意。此時，我才體認到，李霖燦先生對雲南文化研究的影響是如此地深遠。

回台以後，我向李先生轉達雲南友人的問候時，李先生殷殷地垂問，大理的古城門是否健在？崇聖寺的三塔是否依然峙立？劍川石窟中的窟龕造像是否仍舊完好無缺？是否見到了點蒼山的玉帶雲？那次的晤談使我深刻地感受到，李先生對雲南那個地方有著多麼深厚的感情。他在離開雲南後，撰寫〈梵像卷〉、劍川石刻、或是這些象形文字的文章時，其實他心中充滿的是他對雲南人、事、物濃重的思念。雲南不但是他研究的對象，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民國八十一年，我再度赴雲南考察，這次的旅程，我遠赴滇西北的麗

江。到那兒，許多人一聽我是台北故宮來的，不但馬上就向我打聽李先生的近況，更懇切地表達他們對這位東巴文化研究開拓者的景仰之情，且一再提到他們希望李先生能重返麗江的心願。回到台北，我在故宮圖書館中找到李先生。那個下午，我們在故宮餐廳中飲啜著咖啡，談論著白雪皚皚的玉龍雪山、杉樹林立的雲杉坪、麗江古城的四方街、白沙大寶積宮的壁畫、身披羊皮的納西人等。李先生的言談中洋溢著濃重的鄉愁，原來身為河南人的李先生早把麗江當作自己的故鄉。最後我提到麗江的朋友殷切盼望他能回去一趟的想法，李先生搖搖頭，沒有多說什麼，但神情中卻充滿著落寞。二〇〇四年年底，我去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觀「李霖燦教授學術紀念展」，在展覽中看到了李先生於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在雲南考察時的鋼筆寫生，處處流露著他對雲南父老和景物的關懷和愛戀，此時我才深刻地體會到，李先生對他無法重踏麗江土地的深沉悲傷。一九九三年麗江



圖三 清黎明仿丁觀鵬摹法界源流圖 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張文玲攝

納西族自治縣授予李先生「榮譽公民證」，後來李先生又託人將他的頭髮埋瘞在玉龍雪山的雲杉坪，自此他的精靈魂魄隨時都能「玉龍觀雪」，應是他最大的安慰。

我與李先生相識的時間不長，說話的機會也不多。但這一路走來，卻得到他如此多的鼓勵，吾何其幸也。可是我想他對我這個後學晚輩的關愛，並不是因為我在雲南的研究上做出什麼成績，而是他對他魂牽夢縈的雲南所起的移情作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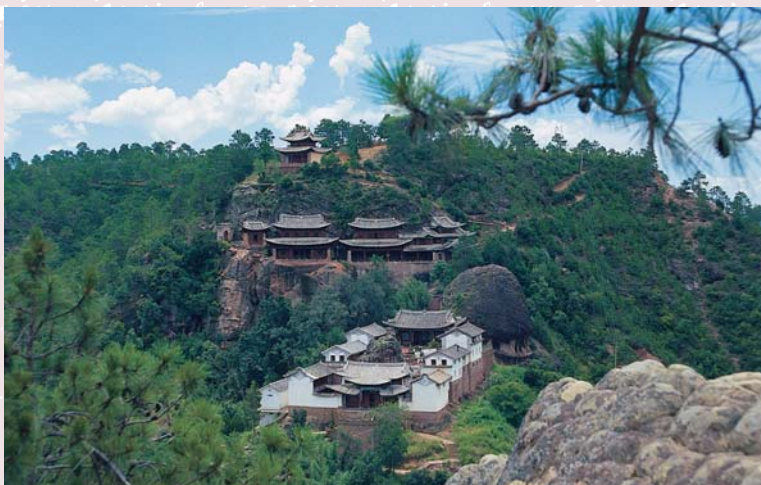
最近，許多故宮的老同事先後退休，我突然驚覺，自己已從二十二年前的故宮新鮮人，變成了老資格。此時才發現日月如梭（這個「梭」恐怕應指的是太空梭吧），趕緊重拾〈梵像卷〉研究的課題，再度展閱李霖燦先生的《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以及許多與南詔、大理國佛教、歷史有關的文章，心中真是感觸良多。

陳葆真教授在談到李霖燦的書畫論著時，曾言：「他的文章清新，偏



圖四 崇聖寺三塔 雲南大理

好以小品文方式敘述作品特色和來龍去脈，而不作嚴肅的學術論辯。」楊福泉在評述李先生的東巴文化研究論文時，也說：「他的論著行文樸實，很少使用艱澀難懂、故作高深的語句，並常常打破論文那種刻板教條的



圖五 石鐘山石窟 雲南劍川

陳規，常常用很平實的語言說出很深的道理。」在南詔、大理國文物的研究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李先生同樣的論述風格。若以現在的學術標準來看，李先生的文章註釋不夠詳實，結構不夠綿密，不太能夠稱得上嚴謹的



圖六 玉龍大雪山 雲南麗江

學術論文。可是在他的文章中，卻有著一般學術論文所沒有的豐沛情感。有一天，我在閱讀李先生的〈南詔的

隆舜皇帝與「摩訶羅嵯」名號考〉時，看到了起首的兩句話：「這批資料的得來十分偶然，其寫成則十分自然。」心中不禁為之一

震。原來，李先生在做學問時，一開始並沒有設定任何研究主題，只是不斷地累積與充實各式各樣的研究資料，有一天可能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原來零散的材料突然間拼出了一個完整的圖樣，然後他就提筆疾書，在這種狀況下寫成文章也就十分自然了。

李先生自幼即有寫日記的習慣，數十年不輟。他稱他的日記為《自言自語集》，並說：「我是一個自言自語者——終日裡揮毫傾吐。」我以為，在李先生撰寫研究心得時，他的心中

並無讀者，也從未考慮這篇文章是否會在學術界引起注意，只是一切水到渠成，他不吐不快。從這個角度來看，李先生的學術文章又何嘗不是他另一種形式的自言自語。對他而言，他和他的研究對象並沒有主、客體的分野，他的研究與他的生命是交融一片的。所以在他的論著中，充盈的是怡然自得和悠遊自在的意趣。李先生曾說：

我是一個快樂的人，因在比較之下，有人是幹一行怨一行或怒一行，好一點的幹一行像一行。我則是幹一行樂一行，做了一輩子博物館員，求仁得仁，至老興致不衰。心想若有轉世大法，還要來陽世數轉。一回研究磁器，一回研究銅器、彫漆、琺瑯樣樣有趣，十次轉世只怕還不能滿足一己之望。

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他治學的態度，也值得我們這些後學好自思省。  
（圖）